

批評與回應

「主義思想類課程 如何退出必修課系列」？

——求教於王則柯先生

● 徐保安

「主義思想類課程退出必修課系列」，應該是未來的一個改革方向。但短期來看，「退出」似乎不太容易。在其退出之前，思謀如何讓其對大學生利大於害，可能也是對學生負責的一種表現。

錢學森的「世紀之問」提出後，中國大陸高等教育令人擔憂的事實逐漸為人所注意。其中最為人詬病的問題之一就是「主義思想類課程」的設置，故王則柯先生以此為突破口^①，請大家探討「主義思想類課程退出大學必修課系列的時機和路徑」問題（頁16）。「主義思想類課程退出必修課系列」，應該是未來的一個改革方向。但短期來看，「退出」似乎不太容易。在其退出之前，思謀如何讓其對大學生利大於害，可能也是對學生負責的一種表現。需要聲明的是，筆者對王先生十分尊敬，本文只是想就一些問題表達一下看法，除向王先生請教外，絕無其他意思。

一 大師的問題

王文的用意是要去除大學的意識形態化，並以此入手探討大學改革成本最低的方案，解決錢學森「世紀之問」的難題。換一種理解，就是按王先生的意思，只要去除了意識形態的

控制，大學就會擁有自主權，然後大學就能培養出大師級的人物。

這裏不擬探討甚麼樣的人物可以夠得上「大師級」，也不願糾纏於大學自主權是否就與大師的培養有必然聯繫，只想探討如下兩個問題：

第一，中國大學能否完全擺脫意識形態控制，或者說完全與「主義思想」脫鉤？

中國教育發源很早，據考證，商朝即有大學。商朝大學學習「禮、樂、舞、射、御」，其中那個「禮」就具有意識形態性質。西周時期的大學也非常重視「明人倫」教育，重視禮樂之教^②。漢朝董仲舒後「獨尊儒術」。隋唐之後科舉取士，《五經正義》更成必修。宋明以來理學興起，科舉走向僵化，儒家經典只剩下了教條式的理解與生硬的記憶。

近代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系統其實存在着兩個相對獨立的體系：中國人自辦教育與教會教育。就前者而言，清末教育改革之後，所制訂的新學制不管是「壬寅」還是「癸卯」，對儒家正統思想的提倡仍一以貫之。民國

肇造，北洋時期仍推崇尊孔讀經。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則強力推行「黨義」教育。就後者言，以1920至30年代「立案」為界點，此前宗教教育是必修課，立案前後宗教教育改為選修，而加入了「黨義」必修課。自然，如王先生提到的，由於種種原因，當時國民政府對大學的控制並未取得政府希望達到的效果（頁17），所以「黨義」課程大多形式高於內容。但是其對意識形態的提倡卻是有目共睹的。至於立案後教會學校雖然放棄了宗教必修，但其宗教氛圍卻得到了保持甚至加強。

當然，宗教教育是否能與意識形態相提並論是可以商榷的，但兩者卻有一個共同特點不容否認，那就是這種「主義思想」，不論是儒家主義、耶穌主義、三民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都構成了校內的主流精神文化；不論必修與否，它都在潛移默化中影響着學生的舉手投足。也就是說，從歷史上看，中國的大學絕大部分時間沒有與「主義思想」脫鉤。

第二，當然也有脫鉤的時候，或者說控制不那麼嚴的時候，這個時候往往也就是能培養出舉世公認的大師的時期，但那又是一個怎樣的時期呢？

中國歷史上有幾個公認出大師的時代：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魏晉南北朝時期玄佛論道、近代中國（1840-1949）大師輩出。葛兆光提出過著名的「盛世的平庸」與「盛世無思想」命題，認為盛唐幾乎未出現值得傳統思想史書寫的大師^③。這就比較有意思了。原來出大師的時代，都是「亂世」！亂世的主要特徵是甚麼呢？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自然，這樣的時代的學校，沒有人給其提供一個能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主義思想類課程」。可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以下觀點：在這樣的

「亂世」裏，普羅大眾的生活比盛唐優越。儘管所謂「盛唐」之下百姓生活也不見得多好，但至少不用每天憂慮能否活着見到次日的太陽。

如果出大師的時代是這樣子的，你還願意要嗎？知識份子當然對自由應當鼓吹不懈，應當關注形而上的精神，可是升斗小民關心的只是已經十分可憐的生活。

當然有人會說，你說的「大師」都是人文學科的，而不是自然科學方面的。誠然，作為一個文科生，對於自然科學大師出現的土壤是甚麼不太清楚，孤陋寡聞，也沒見到相關的研究成果，但有一個例子可以一提：現在的港台大學不注重「主義思想類課程」，諾貝爾獎拿了多少？2009年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高錕喜獲諾貝爾獎，全體華人為之振奮。但是高先生是英籍華裔，其「在純淨二氧化矽玻璃纖維中光波可以暢通無阻地傳遞訊息的思想」^④主要是在英國產生的。

因此，可以結論說，至少對於人文科「大師」而言，其的確排斥「主義思想類課程」，強調去除主流意識形態的控制。可是，從歷史上看，這樣的時代也確實是平頭百姓最遭罪的時候。如果不能改變「亂世出大師」這樣一個公式，不妨還是穩定一點好。筆者雖然贊同將此類課程退出必修課系列，但對能否做到以及做到後會怎麼樣，不能不說心存悲觀，因為歷史已有明證。

二 當前「主義思想類課程」的真實情況

需要說明的是，「主義思想類課程」的準確提法應該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課」與「思想政治教育課」，亦即所謂「兩課」^⑤。除一門已經改為選修的

至少對於人文科「大師」而言，其的確排斥「主義思想類課程」，可是，如果不能改變「亂世出大師」這樣一個公式，不妨還是穩定一點好。筆者雖然贊同將此類課程退出必修課系列，但對能否做到以及做到後會怎麼樣心存悲觀。

由於「兩課」與社會現實緊密相聯的課程特性，教師在課堂上提到的社會熱點問題比其他課程老師要多得多，也敏感得多。將這些問題搬到課堂上，讓思想活躍的年輕學生一起討論，對問題的解決有益無害。

《形勢與政策》外，有四門必修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和《中國近現代史綱要》^⑥。在四門必修課中，筆者對於前兩門不太熟悉，不敢置喙，第四門只要你願意，完全可以當成歷史課來上。第三門其實也是爭議最大的一門課，本文僅就此門課為例，就其現狀及講授的內容和方法的改革提出一點個人意見，求教於王先生及各位方家。為行文方便，請允許仍用「兩課」概念來代替這一門課。

《二十一世紀》2009年12月號〈中國大學服務的水準和品質〉一文的分析，所利用的資訊是「中國北方和南方兩所『211』大學本科生的問卷調查結果」^⑦，其代表性究竟有多大是值得懷疑的。最明顯的是，這些層次比較高的大學（亦即所謂「一本」），可以提供更多的人文教育資源。但是在中國數量更多的普通高校裏面，通識教育是大學生能夠獲得的為數不多的人文素質教育課程。以筆者所供職的一所工科為主的院校來說，絕大部分學生在接觸過枯燥的公式、冷冰冰的實驗設備、複雜難懂的理論之後，還是很想了解一下國際國內局勢和社會熱點問題的，也很願意補充一下高中文理分科以來就已經不再碰的文科知識，提高一下自己的人文素養。

其實，王文中的個別論斷可能也需要稍作調整。比如，王先生提到了錢老的例子，說錢老在晚年談到自己成功經驗時，除本專業外，還提到了物理、化學、繪畫、音樂、攝影等等，就是沒提主義思想理論對他有甚麼幫助（頁19），很能說明這類課是沒有必要的。但是目前大學裏的通識課還有英語和體育，錢老也沒提，是否說明這兩門課對錢老的成功也沒有作用？這樣的例舉可能說明不了問題。

王先生接着說「沒有一位」大師「是因為學習了這些主義思想理論」而成為大師的（頁19），這句話頗有些武斷。筆者所熟悉的歷史學領域，因為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而成為一代大師的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等等，其成就似不可等閒視之。

還有一個說法是「設立思想禁區」論，認為這些課程的主要功能是告誡學生「應該這樣想，不應該那樣想，這個要奉行，那個不能碰」（頁19）。這只能說明王先生太抬舉這些課程了。上述功能好像應該屬於黨政宣傳部門以及國家安全部門，比如網絡員警。幾乎所有一線老師都明白，在資訊手段愈來愈發達的今天，在社會日趨多元的情況下，妄圖在課堂上依靠一張嘴進行思想控制，幾乎是天方夜譚。

事實上，由於「兩課」與社會現實緊密相聯的課程特性，教師在課堂上提到的社會熱點問題比其他課程老師要多得多，也敏感得多。比如對於住房、醫療、教育等改革的成敗得失，拆遷、城管等問題的是是非非，都需要實事求是地分析，對於某些政策的評斷，已經不能用「偉大光榮正確」去簡單搪塞了。這些問題在網絡上炒得熱火朝天，將其搬到課堂上，讓思想活躍的年輕學生一起討論，對問題的解決有益無害。至於不能講違背《憲法》、違反法律的言論，筆者想，任何課程、任何課程的教師都如此，豈獨此一科然？

另外就是關於「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問題。「放之四海而皆準」一語是在革命環境中基於特殊的宣傳需要而提出來的，在一線教學人員那裏已基本無人再提。這句話很明顯違背了「絕對真理是不存在的」這一唯物辯證法原理。我們可以反對這句話，可以不提這句話，但王先生似乎也不好反駁「實事求是」，無法阻止「解放思想」^⑧，不

能否認「與時俱進」，不會反對「科學發展」。

但這並不是說「兩課」就沒有問題，其實「兩課」陷入了困境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這種困境主要有以下表現：社會誤解，學校輕視，學生反感，一線教師自覺尷尬沒有動力。

首先就是社會誤解。社會日趨多元化與社會問題的層出不窮，使人們對思想定於一尊極其反感。在圈外人看來，思想政治理論課定然就是黨的喉舌，只懂宣傳而不會解決問題。一些人往往會用其多少年前政治學習的經歷來看待今天的「兩課」，自然會得出這種課除了「思想控制」以外毫無作用的結論。

談到學校的輕視，作為圈內人士，感觸頗深。其實很多大學安排此類課程時，並不像王先生所說的「把學生一天中精神最好的時間」佔去（頁19），而是放在學生最容易害暈的上午第一、二節或者已經疲勞的下午最後兩節。雖然課時不少，但上上下下對從事該課程教學的一線人員的輕視常溢於言表。這其實也是社會誤解在校內的延伸，王先生就是明顯的例子。更有甚者，網絡上常有「垃圾課」的稱謂^②，實不相瞞，主要說的就是「兩課」。

相對前兩者而言，學生的反感才是最有殺傷力的。概括起來，學生反感的主要理由如下：第一，「政治課」從小學就開始講，經中學、大學，到了研究生還要講，重複來重複去，讓人生厭；第二，所學內容在社會上無甚用處，不能提供生產力，不能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純屬浪費時間；第三，不管何種專業學生，這些課程都需要必修必考，強加於人，致使逆反心理嚴重；第四，為了考試，基本學習方法是死記硬背，而這種方法是公認的「人才殺手」。

種種因素導致了很多「兩課」從業人員開始懷疑自己的事業，甚至羞於向人提起所從事的工作，於是自暴自棄，課程品質當然大打折扣，這又加劇了學生、學校與社會的不滿，引致惡性循環。

社會對「兩課」產生誤解，主要是因為對課程內容不明瞭所致。當然也有「兩課」教學中各種不良習慣的原因，比如照本宣科就屢禁不止。那麼「兩課」到底應該講甚麼、怎樣講呢？

三 到底應該講甚麼

在筆者看來，這種課應該講三個層次的東西。第一層是「主義思想理論」本身是甚麼，這是基礎；第二層是在甚麼條件下，甚麼人，用了甚麼方法得出了這一理論，包括理論出現的社會大背景、理論主創人分析問題得出結論的方法，這是重點；第三層，將第二層所得出的「方法」經實踐檢驗去偽存真後內化，成為我們自己知識體系的一部分，提高我們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難點也是目的。

說到底，這門課就是要為學生提供一種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樣就將授課重點限定在三個大的方面：一、理論原理出現時的歷史條件，並從歷史提出的各種問題出發，還原理論主創人得出見解、創建思想體系的過程，此可稱為「歷史還原」；二、總結歸納理論主創人分析問題、得出見解的方法，此可稱為「方法歸納」；三、為將此「方法」內化為自己的東西，需要在實踐中不斷運用以資驗證其效力，這就需要聯繫國際國內局勢，以最新的時事政治、社會熱點作為案例，利用理論原理主創人使用

「兩課」陷入了困境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主要有以下表現：社會誤解，學校輕視，學生反感，一線教師自覺尷尬沒有動力。社會對「兩課」產生誤解，主要是因為對課程內容不明瞭所致，也有「兩課」教學中各種不良習慣的原因。

的方法(注意是得出原理的方法而不是理論原理本身)進行深入解析，得出自己的看法和觀點，從而培養學生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此可稱為「方法實驗」。

需要說明的是，所歸納出來的「方法」不一定完全經得住實踐的檢驗，也就是說，對於理論主創人的「方法」完全可以提出批評，並在實踐中不斷引導學生去完善。

就筆者的經驗來看，對歷史事實來龍去脈的講解和對當前時政、社會熱點的分析，還是很受學生歡迎的。這也可以解決前述大學生的第一個疑問，因為時事總是在變化的，形勢變，理論方法自然需要變，內容重複這個問題也就不復存在了。當然，講時政不是搞新聞聯播，而是要引導大家去分析和判斷。如果僅僅進行新聞羅列，你不會比學生在報紙網絡中得到的消息多哪去。筆者從教期間，很多學生通過各種方式告訴我，他們就盼着每週的這一天，聽筆者點評天下時事，一起指點江山。這當然是過譽，但也說明，不要小看今天大學生對社會形勢關注的熱情。作為師者，對此不應該壓制，也不應放任，而應該採取某些辦法加以引導和指點，使大家跟上社會發展潮流，不至於讀死書，死讀書。

如此一來，從「兩課」中習得的方法就會成為觀察社會以及指導人生發展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其重要性至少不應該比英語和體育差了吧？既然我們可以花大量的時間學習英語這樣一門「工具」(眾所周知，目前中國大陸學生在學習英語上付出的時間和金錢已到了令人不敢想像的地步)，可以花大量的時間去踢球健身，我們為甚麼就不能學習同屬於「工具」的另一門課呢？學生反感「兩課」的第二點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四 怎麼講與如何考

既然授課重點是讓大家習得一種「方法」，那麼怎麼樣才能達到這一目的呢？

可以披露一點業內幾乎公開的秘密，那就是在一線教師裏面，其教學方式基本可以分成兩大類型：一類是通過補充理論原理來龍去脈的歷史與大量分析時事政治，讓大家習得一種「方法」為主；另一類則是以教學大綱為中心、以考試重點為準繩(以至於在課堂上大量補充講解研究生入學考試試題)，深入分析理論條目以幫助大家記誦原理為主。持兩種觀點的老師都認為自己有理，相互攻擊對方是在誤人子弟。前者指責後者是在培養考試機器，後者則力斥前者離經叛道，不顧學生「考研」之需，害人不淺。

其實，大家都明白應試教育的弊端，將此種教育方式延伸到高等學校裏面更是不可思議。大學本應該是培養自由學習精神、獨立思考能力的地方，卻逐漸成為高四高五一類考前培訓班、輔導站，這與大學教育精神肯定是背道而馳的。故筆者極力推崇第一種教學方式。可是，第二種方式目前勢力極大，甚至很多學生也認為第二種方法極為必要，這主要是因為現行考試制度的存在。

如前所述，「兩課」必修必考是引起大學生反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比較來看，大家其實對必修沒甚麼太大的意見(關鍵看你講甚麼、怎麼講)，而主要是反感必考。讓大家將理論原理的某些論斷記住，去做標準化試卷多少是有些可笑的。應試的弊端已有很多人做出過相當深入的分析，僅就「兩課」而言，這樣的考核方式確實有百害而無一益。

如果一下子還不能完全取消考試——因為實在找不到更好的考察學

「兩課」就是要為學生提供一種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需要說明的是，所歸納出來的「方法」不一定完全經得住實踐的檢驗，對於理論主創人的「方法」完全可以提出批評，並在實踐中不斷引導學生去完善。

生學習成效的辦法，可以考慮改變一下形式。比如可以借鑒公務員考試之申論的形式來作為「兩課」的考核方法。「申論」就是「申而論之」，按照通常理解，「就是指對某個社會問題闡述觀點、論述理由，合理地推論材料與材料、觀點與材料之間的邏輯關係」^⑩。

需要區別的是，「公考」申論是要求考生以一個公務員的身份和視角去觀察問題和分析問題，而「兩課」考生則完全可以不受此約束，以一個學者、知識份子的角度來解析社會問題即可。讓學生運用在「兩課」中學到的方法分析材料進行申論，當可以驗證課堂教學的成效，考核學生對方法的掌握程度和運用能力。當然這種主觀性比較強的考試，只考一次極易出現誤判，所以需要與平時考察相結合。最好的方式，是每個月提交一次作業，讓學生選取本月國內外大事、社會熱點問題，運用本月在課堂中學得的方法進行申論。最後根據整個學期學生的表現對其作出綜合評定。由此反推，課堂教學方式就應該由講授式改為討論式，那麼必然地，為達到討論的最好效果，目前動輒一二百人上課的集中教學模式就需要改為小班模式了。

還有一個涉及眾多大學生切身利益的問題就是考研究生的問題。遵循以上思路，考研政治試題自然也可以採取申論形式。一旦考研改變了考試方式，將是對此類課程改革的極大推動，畢竟中國大陸高校裏面，從教師到學生最為習慣的，還是跟着考試指揮棒前進。

本文的結論是，與其坐等「兩課」退出必修課系列，倒不如思謀一下現階段如何做才能真正對大學生有利。若能在講授內容上淡化意識形態，方法上注意引導學生觀察世界人生，同時摒棄應試教育思維，改革考試制

度，那麼，在退出必修之前「兩課」還是可以對大學生有點作用的。

註釋

① 王則柯：〈主義思想類課程退出必修課系列〉，《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0年8月號，頁16-22。下文引用只註頁碼。

② 熊明安：《中國高等教育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頁7、11。

③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思想史的寫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78。

④ 陳方正：〈以洞見改變世界——祝賀高錕校長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二十一世紀》，2009年12月號，頁4。

⑤ 「兩課」概念最早於1993年提出。參見中組部等：〈關於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黨的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見〉（1993年8月13日），人民網法律法規庫，www.people.com.cn/item/flfgk/gwyfg/1993/206008199303.html。

⑥ 參見中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程在線，<http://sxz.hep.com.cn/front.htm>。

⑦ 張光、段果山：〈中國大學服務的水準和品質〉，《二十一世紀》，2009年12月號，頁76。

⑧ 王先生對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態度可從王文最後一節看出。只不過需要提醒的是，「實事求是」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解放思想」是鄧小平在新形勢下為做到實事求是而指出的一條途徑。參見王則柯：〈主義思想類課程退出必修課系列〉，頁21-22。

⑨ 〈高校師生多數贊成大學「增負」減少「垃圾課」〉，《羊城晚報》，2010年1月29日，引自中國新聞網，www.chinanews.com.cn/edu/edu-xyztc/news/2010/01-29/2099603.shtml。

⑩ 啟正公務員錄用考試專用教材編寫中心：《申論》（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頁4。

若能在講授「兩課」內容上淡化意識形態，方法上注意引導學生觀察世界人生，同時摒棄應試教育思維，改革考試制度，那麼，在退出必修之前「兩課」還是可以對大學生有點作用的。

徐保安 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山東輕工業學院文法學院講師。